

先做好瞭解的工作。

### 3. 文化政策

國家制訂的文化政策，對博物館的發展趨向有相當的影響力，例如國家文藝基金會的獎助方案，文建會、教育部與內政部等政府單位的相關議案與補助計劃，都可應用於蒐集政策的考量因素之中。規劃符合文化政策目標的方案，往往容易獲得補助。

總之，博物館的蒐集政策，是一館的重點工作，應靈活應用各方的資源，勤於探討、廣結善緣、獲得社會認同、充實專業管理技術與保存的環境、設備，採用適當的蒐藏方法、建立作業制度，創造國際聲譽等政策的施展，若有成果，典藏作業應能順利發展與達到一定程度的水準，奠定館方的聲譽。

## 從四庫全書談文物的蒐集與典藏

###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Encyclopedia Sinica

吳哲夫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

## 一、前言

非常榮幸受邀參加本次「博物館的文物蒐藏及典藏制度研討會」。大家都明白博物館功能的發揮，奠基於文物的完備。所以，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蒐集與保管制度，應該是任何博物館從業人員的急務。個人平日既心儀又敬佩國立歷史博物館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今日有機會參與是項業務在功能強化與水準提升方面的研討，高興之餘，更對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用心用意，由衷感佩。

筆者長年服務於博物館中的附設圖書館，是道地的雙重館員，長年工作的體驗，瞭解到博物館與圖書館有許多的共通性。兩者除了同為滿足人類知識傳承的需求所設立外，又共同以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美化人類生活為最高之理想，同時兩者間在藏品收集及利用上也極為相類。雖然，圖書館專限於資料的收藏，但時至今日，資料的詮釋及利用方法已大為擴充，諸如電影、唱片、錄音帶、版畫等等，往往也成為圖書館的收集對象，而各種視聽設備、資訊光碟更被廣泛使用；至於博物館於教化功能之外，還有娛樂大眾的一面，試想讀者於圖書閱覽獲得知識之餘，所享受知識的快感，不正是娛樂之一種！何況事務的考編與研究，捨圖書資料無從發揮，而文字記錄又有待實物的印證，才能更明確與可靠。所

以大體說來，圖書館與博物館儘管略有差別，卻處處表現著異途同歸，用不同的方法，來達成相同的目的，因此，從圖書館的角度探看博物館藏品的徵集及保管，應有異曲同功的妙用。

或者有人要質疑，既然從圖書館談博物館的藏品問題，何以又扯上四庫全書？理由是四庫全書有系統又有條理將我國清乾隆朝以前古籍精華集中於一堂，它等於是一座我國古代文化的專業性圖書館。到目前為止，四庫全書猶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它與長城、運河並列為我國古代文化、國防、交通上最具表徵的偉大工程。史學家蕭一山先生曾舉出四庫全書至少有「學者得以參考也、目錄之完備也、分類之正確也、載籍之完整也、公共閱覽之規定也」等五大優點<sup>①</sup>，也就是四庫全書的修纂，具有完善的收集、詳慎的編目，以及良好的保管利用制度等多項長處。此外，四庫全書徵書的技巧，分類部次群書的改良創新，而且將當日社會知識的眼光擴充到明清時期外來圖籍，亦在在均足以啟發文物收藏單位的觀念，故藉其為題目，或於取法傳統與開展創新方面能有所幫助。

## 二、確立蒐藏特色、規畫索求方向

一個文物集藏機構，面對古今複雜繁多的文物，必然無法全部收納，所以應各按設立之宗旨及本身的性質，規畫出集藏方向，然後全力去執行。四庫全書修纂當年，也面對傳存的大量古籍，卻能在數年之內，成功而有效率的完成修纂的工作，其選件的正確除部分政策性的御製圖書外，普受後世學林的肯定，是因計畫完備與執行者的負責。

任何事務的成功，優秀人才、雄厚財力及周詳計劃都是重要因素。清修四庫全書，擁有天府之財力，經濟自然不成問題，但如果所托非人，眼界不高，大計劃不是難以實現，就是容易流入低俗。所以全書在修纂之始，即先設立四庫館，延攬當時一流的學者入館主持。當日在館的人員，如紀昀、陸錫熊、朱筠、戴震、彭元瑞、莊存與、謝墉、朱珪、任大椿、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王念孫等等，無一不是碩學鴻儒，曠世大家。這些學人都有儒家是中國文化精髓的共識，因此決定四庫全書應以儒家典籍為重心，亦即是認定周永年「儒藏說」的正確性<sup>②</sup>，希望規劃中的四庫全書將是儒家學者著作的大營，正如同釋家之有「大藏」，道家之有「道藏」。不過四庫館臣也認為學術門派往往相互影響，又互相激發，文化工作者應該著眼於廣大及高明處，才能昭久遠而垂範萬世。因此，四庫館臣於「尊經

崇儒」的大原則之下，對於一些所謂「識小之徒，專門撰述」，也以能「增廣見聞」，「羽翼經訓」酌予收錄，而訂下了「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的收書原則<sup>③</sup>。

採集圖書的方針既確立，進一步則考慮到古今著作的複雜性及品質參差問題，所以館臣提出「今昭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sup>④</sup>。將傳存古籍，透過「嚴為去取」的篩選，然後分別等級，做為收錄的標準，就是四庫館臣所曾說的：「道資鑑古，蒐玉圃以羅珍，理取研精，披金沙而聚粹，文河澡潤，兼收眾派之流，冊府精華，別俚群言之液」<sup>⑤</sup>。所謂「披金沙而聚粹」，便是透過「擇其醇備」的功夫，使四庫全書能成為文化的精英寶庫，這種方法與態度，與現代博物館嚴格選擇蒐藏品的態度應無不同。

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四庫全書為了顧及端正人品的另一項教化功能，對作品的選件，特別考量到作者的人格，當日主持修纂的紀昀，即曾有以下的言論：

明之宋濂、李東陽、吳寬、王鏊、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高叔嗣、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為

一代冠冕，悉宜並存。

又說：

諸集中端亮如張九齡，清介如趙抃，忠直如陸贄，學品純正如司馬光，奉使不辱如郝經，雖其著作本有可取，而文以人重，尤以矜式士林⑥。

人品之外，作品內容是否純正，也是徵集的條件，紀昀又說：

文格遞變，偽體日生，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⑦。

謝墉也說：

范祖禹唐鑑，議論純正，極為朱子所推重，故獨取之⑧。

徵集文物留意到世道人心，對於矜式士林，影響後世，甚具正面意義。有了選件標準後，接著便是找出徵集品的所在及擬訂收取的辦法。當時清內府儘管有豐富收藏，還是不足以支持這樣一部文化全面性的大叢書，因而修書之始，清室發動了大規模的訪書運動。面對著浩如湮海的書林，如果沒有重點的胡亂徵求，很難克期竟功，於是四庫館首先訂下甄擇目標：

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

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使，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著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騫，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覆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⑨。

先排除不要的圖書，標示想要的對象，然後考慮到全國書藏的複雜性，因而又進一步確立尋覓的重點方向：

遺籍珍藏，固隨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別省更多，果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

又云：

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

波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者亦指不勝屈，並有原藏書目，至今尚為人傳錄者。即其子孫不能保守，而輾轉流播，仍為他姓所有，第須尋原竟委，自不至煙沒人間；縱或散落他方，為之隨處蹤求，亦不難於薈萃。又聞蘇州有一種賈客，惟事收買舊書，如山塘開舖之金姓者，乃專門世業，於古書存佚原委，頗能暗悉。又湖州向多賈客書船，平時在各處州縣兌賣書籍，與藏書家往來最熟，其於某氏舊有某書，曾購某本，問之無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為諮詢，詳加物色，因而四處借抄，仍將原書迅速發還，諒無不踴躍從事<sup>⑩</sup>。

將人文最盛的東南地區，列為訪求重點，又直接指向大藏書家及有名的書商，目標既明顯，方向又正確，自然能坐收良好徵集效果。不過搜求的方法也相當重要，假使以皇家權勢強求硬取，民間必有隱瞞或反彈，但如果過於寬鬆，則許多寶愛古籍的人士，又不肯獻書，因此，館臣又針對這些可能發生的情況，設立了周詳的辦法，其法約可歸納如下：

#### 1. 獎勵：

此項辦法包括：倍併收購；贈送皇家圖書（凡進出百種或五百種以上者分別致贈內府出版的佩文韻府或古今圖書集成一套）；鈐印（在呈進的各書篇首鈐蓋翰林院印，發還原書後，增加書藏的榮耀）、題詠（選出特別精醇的圖書皇上親為題詠，識於簡端。）、載名獻來之書如經採用，在【四庫總目】書名下載錄獻書者姓名，永為紀念<sup>⑪</sup>。

#### 2. 發動相關人士、全面調查訪求：

- a. 飭各學校教職，親往藏書家，宛轉開導。
- b. 派員至書賈坊林或窮鄉僻壤處，留意購求。
- c. 遴選地方士紳，幫同蒐訪。
- d. 發動僚屬之姻親戚友，協助查訪。
- e. 各省設局並定章程統籌辦理<sup>⑫</sup>。

搜求圖書從城鄉到寫遠的地區，足見執行之徹底及用心之專勤。當然，古代許多優良作品，因其擁有廣大讀者群，所以同樣一種書，流傳的數量不在少數，如果不加以節制，許多複本書堆積如山，也失去訪書的意義，為避免收到重複書，特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十月七日規定：

各督撫等，其即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彙收備採，俟卷帙所積稍

充，即開具目錄，附摺奏明，聽候甄擇移取<sup>⑬</sup>。

進書之前，先開列呈進書單目錄，由四庫館主導甄選，自然不會有重複本的出現。

### 三、詳慎編目分類、標幟部類表徵

文物收集入藏之後，應首先登記編目，既可備遺忘，又方便於點檢利用，且可直接有利於保管及維護。我國自古以來，公私藏書早有一套詳慎的編目傳統，【漢書·藝文志】記載劉向、劉歆父子受命整理中秘藏書是「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這種對每一種收藏給予篇目及詳細說明，以後沿襲而成爲傳統。四庫館臣不但予以師法繼承，且做得最爲完善，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三月十一日，四庫全書館臣首先提出編纂總目的意見：

做劉向、曾鞏等序錄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証，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sup>⑭</sup>。

館臣提出編修總目的構想，爲清高宗所認可，隨即進一步指示撰寫的方式：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提要．．．．每書先列

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書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編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瘁，用著勸懲<sup>⑮</sup>。

四庫全書的編目除了登錄書名、作者之外，更對書籍的相關內容做概略性的整體交待，這樣的編目，甚值得參考，難怪晚清張之洞說：「讀書宜有門徑，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接著又說：「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今日博物館的藏品目錄，如能過編到這種效果，讓使用者可當作藝術或工藝史等來參考，是多麼的有意義！

由於四庫全書載籍廣博，〈總目〉共達二百卷，如果非爲特殊目的查考，在檢尋圖書方面也有不便，四庫館臣也考慮及此，於是又編了一套簡明目錄。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頒令：

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抄刻成書，繙閱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令刊簡明目錄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提要，由提要

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sup>⑩</sup>。

這部簡目只載書名、作者及卷數，類似今日博物館的收藏目錄，全帙還不及〈總目〉的十分之一，如果光就點檢查尋用途而言，甚為方便。

藏品目錄完整，但如果儲放處所位置零亂，毫無秩序，還是無法找到用書，而對藏品的管理，安全的維護都有影響。因此四庫館臣於按目錄排書上架外，又畫出書架明析方位圖，並將各架圖書詳細登錄，於是又有一部〈四庫全書分架圖〉的編定。

當然編目只是帳簿，如果不能按圖書內容給予分類，對於學術門類的彰顯，以及時代學術發展的情況，便無法瞭解，對一位使用者常常會造成不便。四庫館臣思及於此，乃一方面採用歷代以來甚有體系的四部分類法，並又根據具體情況施予適當的調整，使之更嶄新更合理；一方面則倣效明代〈千頃堂書目〉集部按作者年代排列圖書先後為序的方式，推廣到各部類圖書的排列，這樣擇善而從的繼承前人方法，又有合理的創見，遂使〈四庫總目〉被視為歷來最好的目錄。清著名學者周中孚在其〈鄭堂讀書記〉中極具推崇的說：

竊謂自漢以來，簿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

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矣<sup>⑪</sup>。

四庫全書除有完善的編目外，尚有一項特色，便是將各大門類的書在書冊封面標幟顏色，即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用意在於求醒目，易於辨識。這種以顏色為部類表徵，也是有所沿襲的，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秘書丞許善心整理藏書，編成目錄，當時東都長安有嘉則殿，西都洛陽則有修文殿及觀文殿，都有豐富的藏書。隋煬帝即位後，令將各處藏書分為上、中、下三品，以求易於識別，並各以紅瑠璃軸，紺瑠璃軸、漆軸來裝潢圖書。唐玄宗時也令四庫書，各以顏色區分，經庫用玷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用鈿青牙軸、白縹帶、綠牙籤；子庫用紫檀軸、朱帶、碧牙籤；集庫用綠牙軸、紫帶、白牙籤。是知以顏色來協助識別圖書類別，其來久遠。

#### 四、籌畫典藏環境，樹立管理制度

收藏文物單位於徵集藏品之後，便應嚴肅認真的進行藏品登錄及編目，而接續的任務就是妥善的保管及利用功效的發揮。談到保管，典藏環境至為重要，但在提供利用的前題下，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既容易造成損

壞，也可能遺失書冊。這部「綜全書之淵海」的四庫大書，纂成不易，為能昭久遠，就必需考究收藏環境，而要垂世萬方，嘉惠士林又不得不公開利用，既公開使用，難免要有損及原件的顧慮，為此四庫館臣下了許多相關功夫。

四庫全書館對於典藏環境是既師法前人長處，又有所創制。我國古代藏書方面，傳存最久又保管完善的莫過於明代浙江的天一閣藏書，因此在修纂過程中，清高宗即派人前往考察，做為建立藏書閣的參考。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六月二十五日諭云：

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如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具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預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留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倣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具樣呈覽。爾可同我前往指說，

如此明白宣諭，使其曉然於心，勿稍驚疑，方為妥協。將此傳諭知之，仍著即行覆奏<sup>⑮</sup>。

寅著負命前往察看後，旋覆奏云：

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為垣；前後簷，上下俱設窗門；其樑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型，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sup>⑯</sup>。

從這兩則文獻可以看出四庫館針對藏品是紙張的特性，特別注重防火及防濕氣。

此外，虫害也是書藏的大敵，因而又在防虫害上下手。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館臣即建請：



……至於四庫全書面頁顏色字樣，現在酌定款式，又〈永樂大典〉每千本為一套，今擬亦仿其例裝潢，用杉木板為函，以防蟲損<sup>⑳</sup>。

目前度藏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共裝木函六千一百四十四個，不但整齊美觀，而當年防蠹害的考量，更使全書至今完整如新。

藏品貴在利用，但管理的不當，最容易造成遺失或損壞。四庫全書修纂之同時，不僅有公諸天下同好的準備，更對如何制定利用章程有所指示。乾隆四十一年

【一七七六】六月初一日上諭：

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啓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翰林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宜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聞<sup>㉑</sup>。

四庫館臣遵照旨意，乃即擬定管理及借閱辦法覆奏云：

請參仿宋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

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整輯。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以上皆為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例，一切章奏文移，令其繫銜於本銜之上。如遇缺員，領閣事、直閣事，由翰林院具疏請簡；校理，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遴員引見，如遇出差，照日講官例請署。再管鑰啓閉，內府司存，亦宜參仿宋制，置提學閣事一員，以內務府大臣兼充。如遇缺員，即由內務府具疏請簡。再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亦宜參仿宋制，置文淵閣檢閱八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如遇缺員，由領閣事大學士遴員奏補。至閣中書籍，若概許開函繙閱，不無駭損，請俟全書告竣，各藏副本於翰林院。如大臣官員欲觀秘書，准其告之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鈔者，亦聽，不許

私攜出院。如遇疑誤，須對正本者，令其認明某書某卷某葉，彙為一單，告之領額事，酌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討<sup>②</sup>。

對於管理員額數量、人員資格、庫房啓閉、及如何辦理提借等等都予以規定，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副本」的構想，這與今日圖書館對善本書除非特殊研究需要，只提供微片以維護原件的精神是一致的。南三閣四庫全書完成後，又考慮到江南讀書士子特多，利用全書者頻繁，因此又於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二月二十一日頒令：

全書善竣，分貯三閣後，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寫，全書本有總目，易於檢查，祇須派委委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檔案，登註明晰，並曉諭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遺失污損，俾藝林多士，均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致意<sup>③</sup>。

增加了「收發檔案，登註明晰」的規定，又與今日圖書館的借閱及博物館展覽的提件規定相似，足見當年對各閣四庫全書的管理，設想的相當周密完備。

## 五、注重傳統經驗、講求權變創新

我國文化根基深厚，早已建立自我的傳統。任何事務不注重傳統，常會離根離本，空泛不實，但完全墨守傳統，又會阻礙事務的發展。四庫館臣在如何學習傳統及開拓創新方面，做得相當成功，茲舉三則為例：

1. 擇善而從，不泥於一家之說：四庫館臣在編目方面，處處學習並繼承古法，卻又能根據事實，匡正古人所不及。其在四庫薈要凡例中曾說：

分門別類，如歷代史志，鄭樵【通志略】、  
【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  
【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焦竑  
【經籍志】及諸家編目各有不同，或間相糾  
正，今悉為參考，擇其區別精當者從之，未  
敢泥於一家之說也。

對前代編目擇善而從外，對前人分類不當的書，又一一改隸於其他適當的類別：

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  
...如【筆陣圖】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  
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  
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  
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弦工尺者，不

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傳】、【飛燕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凡斯之流，不可殫述，並一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真<sup>④</sup>。

既能師法前人所長，又能匡正古人之所不逮，梁任公極爲之稱頌，曾說：「其（指四庫總目分類法）述作義例之周備，實已爲〈崇文總目〉以下所莫能逮。」

2. 清高宗及四庫館臣都瞭解文化必須著眼於廣大及高明處，因此在選書方面，雖然以尊經崇儒爲大原則，但還是顧及賅通權變的重要性，而廣收其他足以「增廣舊聞」、「羽翼經訓」的書籍。清高宗四十年（一七七五）四月曾頒諭：

顧四庫之藏，浩如淵海，必權衡有定，去取乃精。昔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專崇孔氏，陶宏景則一事不知，引爲深恥。今將廣收博采，而傳注時多曲說，稗官不免誣詞，異學混儒墨之談，僞體濫齊梁之豔，於人心世教，未見有裨。但如墨守經師，胥鈔語錄，刊除新異，摒斥雕華，則九流之派未疏，七

略之名不備，抱殘守匱，亦難語賅通<sup>⑤</sup>。

四庫全書根據此項原則，也說「凡能自明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因而訂下「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的收書體例，在豁達的胸襟下，四庫全書終於成爲具有四十四類六十六子屬的一部綜合性文化大叢書，而不抱殘守缺，賅通權變，是成功的重大因素。

3. 文化是群體人生的共業，範圍廣泛，彼此間互有旁參的功用，所以文化能不固步自封，才能愈見壯大。我國古來即有：雖小道必有可觀，而芻蕘狂夫之言，也不加廢黜的傳統觀念。我國文明雖誕生早，發展快速，但從來即不排斥外來知識，例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均著錄佛釋經籍，而【隋書經籍志】也載錄外來醫書十餘種之多。中國人長久以來與鄰邦來往，早對天下之廣闊有所認知，同時爲不自限於孤陋寡聞，對外在的世界，自來感到興趣與重視。因此傳統中國知識界不斷的有介紹外在世界風土人情等專書的出現，如劉宋時釋法顯的【佛國記】、唐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董越的【朝鮮賦】等書，均是其例。四庫全書地理類外記之屬，盡收

以上各書外，又增錄多種歐西這類作品，如意大利人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比利時人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等書，更使當時知識界的眼光，擴散到澳、非、美等洲。四庫館臣將這種不自限於孤陋寡聞的傳統精神予以發揮，使圖書的蒐集廣及於流傳國內的外來作品，用從古開新的弘大眼界來暢通文化生命，意義極為深遠。

## 六、結論

蒐藏是任何博物館的根本，而典藏則是其護本的工作，此兩項業務的完整完美，博物館其他功能才易於體現與發揮。四庫全書，薈萃群籍，為前代著作做總結，猶如一座我國古代文化的圖書館或古人作品的博物館，它在蒐集及典藏上有幾點甚具啟發性：

1. 洞悉文明發展創造的過程，表現既尊重傳統又能開拓創新，以從古開新來求延續與光大文化。
2. 用開放融攝及廣納百川的精神，對所有學術門類及中外知識均予重視，有暢通文化生命的期待。
3. 選件顧及文化發展系統，意在啟示「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並以之激發文化意識及樹立文化理想。
4. 透過整理研究，正確的分類編目，來關心使用者

的方便，同時建立完整的帳簿，供作群書之管理。

5. 注重創作者的人品及思想，導正世道人心，垂範來嗣。

6. 借重他人成功的典藏經驗，規畫完善制度，維護書冊使之傳示無窮。

四庫全書蒐集上力求作品種類、系統與數量上的完整，又能講求保存與分類研究的正確方法，值得蒐藏文物的借鏡。而四庫館臣能借助他人經驗，汲取傳統又給予改良開展，今日談博物館的典藏及維護文物工作，如果也能在傳統方法及新科技的引進方面求取平衡，相互為用，則典藏工作會更成功而完美。至於博物館「以展示人類文化締造發展之軌轍，予參觀者對未來前途之啟示」的宗旨，或正與四庫全書若干觀念與精神，殊途而同歸。

## 附註

- ①蕭一山撰，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五十一年九月修訂本臺一版），卷中，頁六六-六七。
- ②周永年撰，儒藏說，收入松鄰叢書甲編（民國七年仁和吳氏雙照樓刊本）第三冊。
- ③陳坦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北平圖書館，民

- 國二十三年)上册,頁五。
- ④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五十八年影印),卷首,凡例。
- ⑤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清乾隆間摘藻堂抄本),卷首,聯句詩。
- ⑥同註五。
- ⑦同註五。
- ⑧同註五。
- 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前引書),上册,頁一。
- ⑩同前註,上册,頁十二。
- ⑪贈書、鈐印、題詠、載名等四項獎勵獻書辦法,見於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及七月二十五日上諭,收在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卷首,頁四。
- ⑫詳見吳哲夫撰,四庫全書纂書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七十九),頁三十八。
- ⑬辦理四庫全書檔,(前引書),頁二。
- ⑭同前註,頁九。
- ⑮吳哲夫撰,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五年),頁六十二。
- 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前引書),上册,頁二十九。
- ⑰清中孚撰,鄭堂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四年),卷三十二,頁十一。

- ⑱辦理四庫全書檔,上册,頁二十六。
- ⑲東華續錄,乾隆七十九條。
- ⑳辦理四庫全書檔,上册,頁十。
- ㉑同前註,上册,頁四十。
- ㉒東華續錄,乾隆八十三條。
- 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小方册上諭檔,編號〇〇二三。
- ㉔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前引書),卷首,凡例。
- ㉕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影印),卷九八一,頁一四三九九。